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黄裳
著

春夜随笔

成都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春夜随笔

黄 裳 著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春夜随笔

著 者：黄 裳
责任编辑：谭继和 濮禾章
封面题字：周明安
封面设计：张光明
技术设计：盛奇萍
责任校对：刘仕菊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 7765071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排 版：四川三达计算机公司
印 刷：成都市文化用品厂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1/32
印 张：8
字 数：150 千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05—4·I·151
定 价：6.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报刊，杂文辞典，杂文专集的出版。各地杂文学会也应运而生了。听说还有省委领导自写杂文提倡杂文之说。嗟吁盛哉，杂文之兴起也！这大概又证明一个道理，凡是杂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是国步维艰的时候，凡是杂文兴盛的时候，也是国运走向兴隆，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恐怕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我们正在改革前进，盛世有望。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在泥泞中前进，然而我们的前面却已光明在望。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与困难，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诅咒，庄严工作与荒唐糊涂，杂然纷呈然而充满着生气的大转变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前进不易，旧意识趋于消逝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



权威的光辉，许多认为不可更改的观念，突然变成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的偶像，忽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新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并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总经理的指挥台，指挥千军万马，从事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凡此种种，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创造，大多数的人在大步前进。然而也还有人在怀疑，在摇头，在叹息，在引经据典地辩论，甚至有的人在时代暴风雨的面前向隅而泣，在咒骂和贬损。

这样的时代，五光十色，瞬息万变，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能满足于道理深奥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欢呼，需要呐喊，需要马前卒为他们鸣锣开道，需要清道夫举起匕首和投枪，为他们清除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切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习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人们需要匕首和投枪，人们需要杂文。

于是杂文应运而生了。于是出现了一新耳目的杂文作品。于是出现了当行出色的杂文作家。于是出现了杂文的鼎盛时代。

既然叫做杂文，看起来似乎是杂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余酒后，是非得失，世道人心，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



不可谈的了。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杂文，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正如鲁迅说的，它“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杂文和现实生活总是贴近的，和人民脉搏的律动总是息息相关的。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之中见是非。它要发人之欲发而未发，言人之欲言而未言者，是写众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这和那种吃饱了打着饱嗝，剔着牙齿，闲侃神聊，插科打诨，言不及义的侃文，或远离尘世，闲情逸致，无病呻吟的闲文是不同的。

因此杂文即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艺术的魅力，具有历史的思辩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没有对于新社会诚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文学功底是办不到的。因此一个好的杂文作家，如果严格要求起来，就要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家的洞察世事的能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具有理论家的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分析事物的能力，具有学术家博览群书的渊博知识，具有散文家的汪洋恣肆，斐然成章的文字功夫，还要具有诗人的烈火般的热情和一往直前的无畏勇气。要像鲁迅那样做到这一步，或接近这一步，杂文作家要作毕生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杂文作家在专制的旧社会里，是注定要忍受“窃火者”的痛苦和灾难的。就是在思想解放、杂文勃兴的时代里，杂文作家也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注定要在风雨中讨生活，在荆棘中寻路而行。他们可能在泥泞的荆



棘中仆倒，可能受到某些视杂文如眼中钉的人的嫉恨。这倒没有什么，因为那些人的某些行径，正是杂文鞭挞的对象，受到他们的嫉恨，正是杂文的光荣。但是也有时，或由于有些人囿于一种传统偏见，以为杂文“偏激”、“片面”，或由于杂文作家在使用这个锋利武器的时候，疏于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至于偶批逆鳞，为忌讳者“对号入座”，于是兴师动众，打上门来，大张挞伐，以至“对簿公堂”，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想，作为一个满腔热忱热爱祖国，决心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做精神垃圾的清道夫，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同时，我想，当前的决策者们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那些在硝烟弹雨中打冲锋的战士，偶尔失手，是难免的。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宪法。还有什么人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来，在杂文作家的身上，施展过去的身手，冀望点什么，大抵是很难的了。

当然，我想一个杂文作家，自然是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于改革开放寄以真诚的希望，对于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于事理有充分的理解，对于敌友泾渭分明。因此，行文是会实事求是，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形在江湖，心存汉阙，针砭固取典型，臧否更有分寸的。这样，庶几可以无过乎。

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使读者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这就要求杂文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形式和风格上力求多样化。那么除坚持“二为”方向外，“双百”方针就永远是杂文的指导方针。

全国各家报刊刊登的杂文已经不少，散出的杂文专集也很多，但是选出若干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著名杂文作家，各人自选一本杂文，成系统地出版，尚不多见。成都出版社有志于此，我颇赞成。他们已经得到若干不同风格的杂文作家的支持，才使《当代名家杂文系列》第一辑得以问世。在雅文学出版陷入困境之际，他们有胆有识，做了这么一件大功德事，令人鼓舞。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选本是认真的，编印是出色的，货真价实，决没骗人。正如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出版时说过的，“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的用处的东西。”我相信读者也可以从这套《当代名家杂文系列》里，读到合于自己口味的文章。

我故乐为之序。



目 录

目 录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1)
关于“知识产权”	(1)
罗王之间	(11)
关于安桂坡	(14)
春夜随笔	(24)
“新”“旧”红学家——春夜随笔之二	(28)
关于“自叙说”——春夜随笔之三	(32)
麦克风之类——春夜随笔之四	(36)
说扬州	(39)
鲁迅与顾颉刚	(46)
读书的回忆	(51)
南开忆旧	(55)
记者生涯	(63)
我写游记	(69)
往事回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诞生	(73)
书林漫话 (与刘绪源对话录)	(78)
卷 蔬	(95)
《玉君》与杨振声	(100)



沈兼士·····	(104)
三 叶·····	(108)
天行山鬼·····	(111)
忆师陀·····	(114)
悼风子·····	(119)
忆钦源·····	(123)
弢翁遗札·····	(127)
记郭石麒·····	(131)
记徐绍樵·····	(135)
沈从文的信·····	(140)
故人书简——叶圣陶书二通·····	(144)
俞平伯遗诗·····	(148)
湖上访书记·····	(151)
四印斋·····	(159)
说《中国罕见书录》·····	(163)
六朝文絮·····	(168)
柳如是的几本书·····	(172)
蕪葭楼诗·····	(175)
太和正音谱·····	(178)
关于散文·····	(183)
反封建离不开旧戏·····	(187)
曹操的故乡·····	(190)
书 缘·····	(194)
《书前书后》序·····	(196)
漫谈题跋·····	(198)
漫话《桃花扇》·····	(200)
蟋蟀的书·····	(204)



老年与书·····	(207)
蟋 蟀·····	(210)
随笔两篇·····	(212)
尺 八·····	(216)
话说西施·····	(218)
萧云从·····	(221)
秋 柳·····	(224)
王渔洋遗诗·····	(229)
人参与烟草·····	(232)
说麻胡·····	(236)
龚自珍与魏源·····	(239)
《围城》书话 ·····	(241)
《围城》书话续 ·····	(243)

目
录



关于“知识产权”

中国过去大抵不大重视所谓知识产权问题。各朝法律都没有相应的条文，也不见有谁为了著作权或发行权去打官司的记载。只是间或在宋明书坊刊行的书籍中看见过类似后来“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告白。这自然是出版开始商业化了必然发生的现象。旧时文人有了著作，总千方百计地设法刊行，当然并无经济目的，那时没有稿费也没有版税的。为的是文人学者的“名”。自然，像白居易那样把全集分抄几部藏在几处庙宇里以图流传后世的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后人”的也不是没有，不过说到底也还是为了名。于是不为名的著作家就格外稀见而受到敬重。自然，为了种种原因不愿以真名示人的使用笔名或化名者，不在此列。

人们都知道，鲁迅早年花了许多功夫辑集校定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刊行时就用了周作人的名字。他还有意将《古小说钩沉》同样用周作人的名义刊行。这种不求名声全出个人爱好的治学态度是极少见的。类似的例子我只知有一位许榘。许多年前我看见过许珊林寄给丁俭卿的一通手札，是商议刊印《张亟斋遗集》的，信尾说，



附去《钞币论》十本，有同好者，即烦分致。此弟手制而署名舍弟者，正之。

这使我们知道，署名“海昌许楣撰”的《钞币论》其实是许珊林的著作。

过去有许多著作，署名的作者往往并非真正的执笔者，情形相当复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很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鬻资刻书者。这里有许多例子。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十三，光绪丁未六月初三条云，

又《积古斋钟鼎款识重识》稿本三册，一夹板。此书本出朱椒堂侍郎，旧题《钜经堂金石跋》。阮太傅借刻，改为《积古斋续钟鼎款识》，其后又去续字，并有点窜删补处，皆文达手笔。廉访为侍郎重孙，以稿本付石印。旧闻郭象注庄出于向秀，今睹此本始信。

这是很典型的例子。至于作者有意将自己著作假名他人者也所在多有，用意各有不同。段玉裁撰《戴东原年谱》：

（乾隆）十七年壬申，三十岁。是年注屈原赋成。……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



所自为，假名汪君。《勾股割圆记》以西法为之，注亦先生所自为。假名吴君思考。皆如左太冲《三都赋》注假名张载刘逵也。

《屈原赋注》，周叔弢有重刻本，雕槧甚精，卷尾有庚辰仲春歙汪梧凤跋，就是年谱中所说的“汪君”，他说“右据戴君注本为音义三卷。”又说明著书始末，花了九年功夫，似乎并非“假名”。看来汪梧凤可能是为东原刻《屈原赋注》的出资者，以是因缘，得以列名卷末的吧。

吴士鉴撰《晋书斟注》，刘氏嘉业堂刻行。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与吴氏共同列名作者，其实刘只不过是出资刻印者而已。

引起不少纠纷聚讼不已的是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近代论及此书著作权的有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和钱钟书的《管锥编》。原书于光绪丁亥刻于广雅书局，系据原稿上板。王毓藻刻书序云，“方柳桥以五百金得严氏原稿，点窜涂乙，丹墨纷如，皆广文手笔。”严氏自序也说“肆力九年，草创初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遗补阙，整齐画一，乃克竣事。”这样，书出严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不过对此书的编者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李申耆年谱》说这书是道光二年李申耆在扬州花了五年时间纂成的。缪荃荪还说他曾见过李氏的原稿。谭复堂则说此书纂辑实出孙伯渊手。（《复堂日记》据吴山尊日记）俞理初则说此书“实阳湖孙渊如观察之力。”但也说“丙子，铁桥复搜校古书及金石、稗官，其文真实可据者，乃能补至十分之一。”他是主张孙创严补说的。李详



《槐生漫录》也力主俞说。钱默存指出此说之病，及旧说中的矛盾。“李兆洛谱称孙星衍始辑唐以前文，兆洛终其事，而孙星衍谱称孙兄弟与严氏同辑，一则不及严，一则不及李。”更进一步拈出严铁桥《答孙氏问》中，“面斥孙星衍之不学，仅读《说文》‘开卷四条’、‘未治古音’，词气轻薄，使果相沾丐，何敢无顾藉乃尔？独不虑盗伤事主之词哉？”钱默存的结论是，

严孙或始欲协作，渐即隙末，而严不舍以底于大成，孙则中道废置。故严叙绝不道孙，以原有共辑之议，恐人以己为掠美也；而孙谱必道严，亦正以初议共辑而终让严氏独为，恐其书成而专美也。

这是符合事理的平情之论，从中也可以看出学人文士之间钩心斗角的情状，是很有趣味的掌故。傅增湘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如此，但他又指出，

孙李诸公原辑起汉、魏，迄于隋，故称《八代全文》。严氏又补辑上古、三代、先秦，遂改题今名，其为功至伟。前古后今，相得益彰。第必自矜创作，谓前无所因，则殊形其隘耳。

这是学术界著名的一场著作权纠纷，也是基本上得出了定讞的一案。与此情形相类而终于闹出了双包案的是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和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郑天挺有详考，在《探微集》中，他的结论是：



窃谓杭、赵两书，盖由世骏创为义例，发其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征据相近。然两书均未完成，故两家集中未及其事。两氏既卒，后人得其遗稿，辗转传录，遂并行于世。实则，若以毕沅、王先谦两家《释名疏证》例之，赵书既行，杭书可废；惜乎一清未能全袭世骏之文而辨证之也。

这是与戴、赵《水经注》一案相类而未引起普遍注意的一点小纠纷。赵一清不是剽窃他人著作的人，他与杭世骏的关系也不同于与戴东原的关系。多少年来，在《水经注》研究中，戴的窃赵几乎成为定论，最后胡适挺身而出，花了极大气力为他的同乡前辈辩诬，但效果不大，未能推翻旧案。但这场大辩论，明确地反映了学术界对著作权的重视与对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的深恶痛绝，却是有深远意义的。

陈援庵有《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刊于《陈垣学术论文集》中，以可信据的文献资料证明《书目答问》为张之洞原著，并非缪艺风代撰，是很有趣的一篇考证文章。陈先生先引康有为、李慈铭、陆心源诸家之说，都不怀疑张的著作权。光绪十九年叶德辉跋《书目答问》，才提出“同年友杨叔翘锐为吾言，此目出缪太夫子小山先生手，实非南皮己书。”柳诒征也有“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的话。于是此书的著作权开始发生问题。缪氏光绪三十四年为《半岩厂所见书目序》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



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荃荪时馆吴勤惠公督署，随同助理。”此文撰于张之洞未卒之前，说助理而非代撰，陈先生以为“较可信据”。张之洞逝世后，艺风的话就变了。《艺风年谱》光绪元年条说，“八月，执贻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民国2年《题边袖石诗词手稿》说，“光绪乙亥编《书目答问》，南皮师属以空青词入词家。”都直说书出己手，不再是“助理”了。援庵先生说，“二公皆已作古，无从质证。”是含有批评的微意的。陈先生又收得光绪二年张之洞与王懿荣手札，是寄《书目答问》请居京诸友论定的一封信，其中就有“又一本并一函，寄缪小山进士，望转交，属其订正，亦即详列见覆为要”的话，如书为缪氏代撰，则张之洞何必又专函请他订正呢？张之洞的请缪艺风助编《书目答问》与毕秋帆、朱竹君的请章实斋、汪容甫等入幕编书一样，是一时风气。缪艺风是当时编纂的重要助手，应无问题，说是代撰，则远非事实了。

近代还有一宗纠缠不清的疑案，是《殷墟书契考释》的作者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一九八三）收罗继祖和张舜微两篇论文，都涉及此书，两文都是批判王国维而为罗振玉辩解的。现在编入王的纪念文集，确也显示了一种特色。《考释》一书的手稿后经陈梦家发现，作者本已不成问题，但说此书写成与王国维毫无关系，则还有讨论的余地。《考释》初版不只由王国维手书上板，而且在王的“后序”中还说过这一节话，“余从先生游久，时

